

陈忠著

方志敏狱中文稿研究

崔廷瑜题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方志敏研究系列丛书

陈
忠
著

方志敏狱中文稿研究

崔廷珍题



(增补本)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志敏狱中文稿研究 / 陈忠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5034 - 1664 - 5

I. 方… II. 陈… III. 方志敏 - 作品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90847 号

责任编辑: 李春华

封面设计: 鸿艺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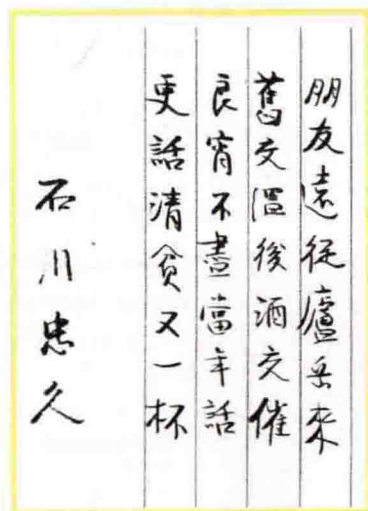
书 名:	方志敏狱中文稿研究
作 者:	陈 忠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京东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京东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28 千 插页:2
印 数:	001 - 2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34 - 1664 - 5 / G · 0326
定 价:	2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02年,在东京,
向日本朋友介绍方志敏的清贫观



日本著名学者石川忠久
教授的赠诗

2004年,在南昌,
向大学生朋友介绍方志敏的爱国观





2007年3月,陪伴方梅同志(方志敏的女儿)在广东省茂名市大中学校和军营,巡回宣讲方志敏精神,受到热烈欢迎。



借序：永远的丰碑——方志敏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当我们吟诵方志敏的不朽诗篇，无不为此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肃然起敬。

方志敏，1899年生，江西省弋阳县人。

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红11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

年1月27日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诚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原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6日）

自序：大爱大恨的民族英雄

应江西某高校的邀请，日前我连续作了三场以《可爱的中国——方志敏人生的原点》为题的学术讲演，听众全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现场互动过程中，有热烈的掌声，有泪流的面颊，更有耐人寻味的发问：

——“方志敏离我们很久远了，有一种陌生感。刚才会场上响起一阵阵掌声，坦白地说，我一次也没有拍手。不过，听完了整场报告，身上有点发热的感觉。”

——“国民党政府难道真的那么可恶？那么坏？非要用武力去推翻它？打仗是要死很多人的，有没有别的办法避免战争与死亡呢？”

——“方志敏在怀玉山曾经冲出了敌人的层层重围，已经赢得了生的希望。为什么他还要营救少数战友又冲进包围圈，导致被俘，使全党与自己蒙受更大损失？”

面对着如此尖锐、尖刻、尖酸的诸多拷问，顿时，我感到一阵阵震动、震惊和震颤。因为，这不仅需要迅速作出认同，或正面认同，或负面认同；更在于，乍一听，这些各自的言语表述，似乎太浅薄、无知、缺乏政治水准了。通常，我们习惯站在老师的位置、教育者的位置和正确者的位置，居高临下去俯视学生和看他们提出的问题，一付挑剔的眼光，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倘若

我们试图站在当代有文化、有思想的青年大学生的位置上，以平等、平静的心态去解读，不难发现，这恰恰是他们在深度投入、深省问疑、深情敞怀后，一种真实的理性思辨的内心表白。难道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我真的由衷感激这些想啥说啥的青年朋友，至少它帮助我推进了对方志敏的深层探究，才有了这篇感言。

问得好呀！方志敏为什么要抗日？方志敏为什么要反蒋？方志敏为什么要营救战友而不惜牺牲自己？人们不是自觉追求“以人为本”、“生命高于一切”吗？——这些看似幼稚的提问，就象一群童心童趣独具、且多思好奇的孩子，最爱仰视长者的脸蛋探问——“我是怎么生出来的”——这类最基本的问题，反而弄得大人在公众场合挺尴尬的。其实，大人懂的问题，孩子未必懂；老师明白的道理，学生未必明白。我们不可以回避对这类“最基本的问题”的思考与解答。

（一）方志敏面对的只能是他那个时代最严峻的社会问题

人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中。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儿。人的一生，都会面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诸如成长问题、生活问题、求学问题、求爱问题、家庭问题、工作问题、交往问题、社会问题等等。这是极普通、极正常的现象。

可时下，有相当一部分人，却害怕问题、掩饰问题、讨厌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儿童”、“问题学生”之说，并歧视他们。令人奇怪，是不是人们的“思维定势”出了问题？

何谓问题？问题就是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是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和疑难。有本过目难忘的书，是德国人贝蒂娜·施蒂克尔编辑的，叫《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前言”里写道：“大问题，小问题，愚蠢的问题，聪明的问题，傻

问题，好问题，简单的问题，艰深的问题——整个生命充满了问题。”“人之所以是人，第一是因为他提问题，而第二则是因为他想回答问题。”“问题是生活的发动机。一个问题被人们提出来并且开始寻找一个答案，仅仅是这个事实就会激起人们的幻想。”人生“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不再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了。

如果从“问题”的视角出发，重新研读方志敏狱中文稿，我有一个新的发现：他对自己的求学问题、家庭问题、生病问题、求职问题、爱好问题、妻儿问题等等，十分关注，文稿中均有涉及；然而，凡涉足自身的这些问题，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他对身外的社会问题、民众问题、时政问题、国家问题、革命问题、政权问题等等，更为关切，文稿中多处详尽研讨，甚至不厌其烦。这说明，方志敏的问题观，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总是冲破个人利益的樊篱，追求大视野，谋求对社会利益的有效解疑与解答。换言之，方志敏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社会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

方志敏的问题观，从认识根源上讲，他不盲目从众，他不盲目从书，而是内生的，重视社会实践；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其人生的经历、阅历相关，与其性格相关。20世纪初叶，中国面临“世纪交替”，面临大动荡、大变革、大危难的社会环境。此时的方志敏，从幼小读书，继而走向社会，接着投奔革命，他经历的是从封闭的穷乡僻壤闯入开放的城市，经历的是惊心动魄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五四学潮、抗日浪潮、反蒋怒潮，等等。他始终站在风口浪尖，接受时代的锻炼与考验，社会问题让他揪心，中国前途让他焦虑。

在那个年代，最最严峻的社会问题，莫过如“国家”的兴

衰成败、生死存亡。《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第一节“黑暗的故乡”里，方志敏写道：

这个地方，在革命前，无论那方面的情形，都是很黑暗的。在清朝皇帝统治时代，那时，我生世未久，还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孩子，一点事情都不知道，不必说了。就是经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我是渐渐的长大了，据我所知，情形也是愈弄愈糟，没有一点好的现象。因为辛亥革命，只是做到推翻满清，变帝制为共和一些政治上表面的改革，对于侵略中国十分凶恶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但没有动它的毫毛，就连打倒它铲除它的口号，也没有明白的提出来。其次，辛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注重在清军和会党中活动，在广大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中，就根本没有怎么注意，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下层广大工农群众，对于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观，没有广泛的发动起来参加革命。革命方面，没有雄厚的群众力量的帮助，当然是不能有力的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肃清封建势力伟大的革命事业；相反的，南京政府成立不久，革命势力就被反革命势力压倒，所谓南北议和，实即是革命屈服和妥协于反革命；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也就让位于中国贵族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了。从此，辛亥革命便夭折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此，不过去掉了一个溥仪，换上另一个统治代表袁世凯而已。

故乡为何是“黑暗的”？根源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光明”，

“国家”腐朽。

首先，一个曾经绵延数千年且称雄世界的中国封建王朝，从近代开始，却一步步迅速走向衰败，最后进入了死胡同。堂堂的中国人，被人视为了“清国奴”。清王朝让人绝望了。所以，当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以他为首的同盟会，领导和推动民众，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很快就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帝王制。在方志敏看来，废除“家天下”，推倒封建君主制，“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使“国家”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他对新生的“中国”寄予厚望。

其次，“推翻满清，变帝制为共和”，这从国家观念与实践讲，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革。“共和”，即“共和制”，它是相对于“君主制”、“君主国”而言的；“共和制”，即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采取这种制度的国家叫“共和国”。尽管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家性质，但“共和制”应该说是现代社会一种取得了共识的先进理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并成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与建国方略。然而，实践与主张背离，导致了方志敏对这个“新的中国”的失落与失望。孙中山也好、辛亥革命也好、中华民国也好、南京政府也好，在方志敏看来，其致命的弱点：一是没有发动和依靠“工农劳苦群众”，革命之“根”没有深深扎在“民众”之中。二是“革命屈服和妥协于反革命”，即使是孙中山，也很软弱，他曾“让位于中国贵族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屈从于垂死的封建势力与军阀势力，没有肃清这些势力的影响。三是“不能有力的完成驱逐帝制出中国”。更令方志敏悲切与悲愤的是：国民党和他所领

导的南京政府，不仅没有“还政于民”、“驱除鞑虏”，还“不惜出卖中国，求得帝国主义大力的帮助，用飞机大炮、枪和刺刀，用各种他们能想到的方法，去‘围剿’红军和苏区，想把全中国正在如火如荼的反帝国主义的土改运动，浸到血泊中去。”如此“新生”的中华民国，“情形也是愈弄愈糟，没有一点好的现象。”于是，又一次让人绝望了。

再次，中国既有“内忧”，更有“外患”。早在1840年，英国人以鸦片买卖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导致清政府屈膝投降，签订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谓“半殖民地”，就是一个形式上独立，而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哪里还有民主、自由和尊严？哪里还有团结、稳定和发展？看见那些行驶和停泊在中国内河里的“很多外国兵舰”，看到满街那群“昂头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的洋人，看着上海公园门口那块“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方志敏心里总是“愤愤不平”，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他对国家的痛心、痛苦、痛惜、痛恨的内心感受，全都淋漓尽致地描述在那篇《可爱的中国》里了。

解码方志敏，不难发现，他一生最关切的头等大事，是“国家”问题，是“关于爱护中国，拯救中国的问题”。

（二）方志敏努力用大爱大恨去成就自己的崭新事业

在特定时空生活的人们，常常会对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或强或弱的心理反应；常常会对人对事对景对物，表现出关切、喜好的心情。社会里的人，谁都无法摆脱自然环境、家庭环境、人文环境、地域环境、劳作环境、国家环境的影响；必然在这些环境中被生育、养育和教育，从而培育出一种爱家、爱乡、爱国的深厚情感。通常说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人们对祖国的河

山、文化、人民以及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最深厚感情，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关心，对祖国的忠诚和献身精神。这种情感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千百年巩固起来的历史范畴的精神资源，世代承传。

不同时代、不同人们，对爱国主义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解读；即使都讲爱国主义，其具体内容也是各不相同的。怎样“爱护中国、拯救中国”？这里不仅有认识问题、情感问题，更有行为问题、实践问题。人的行动是人的情感的外在显现。请阅读方志敏如下一段充满细节、细致、细腻、细究的文字：

朋友，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来，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这是刻不容缓的了。但是，到底怎样去救呢？是不是由我们同胞中，选出几个最会做文章的人，写上一篇十分娓娓动听的文告或书信，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略呢？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说、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去向他们游说，说动他们的良心，自动的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国呢？抑或挑选一些顶善哭泣的人，组成哭泣团，到他们面前去，长跪不起，哭个七日七夜，哭动他们的慈心，从中国撒手回去呢？再或者……我想不讲了，这些都不会丝毫有效的。哀求帝国主义不侵略和灭亡中国，那岂不等于哀求老虎不吃肉？那是再可笑也没有了。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呢？

怎样才是“爱护中国”？怎样才能“拯救中国”？怎样在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成就事业？方志敏狱中文稿昭示人们：

首先，需要大爱，需要大恨。爱也，恨也，这是为人的一种情感表现。爱与恨的概念，最先产生于人类的道德意识，是道德伦理学史中的一对重要的范畴。作为道德原则的爱与恨，从它开始出现，就体现了劳动人民建立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愿望。《管子》云：“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礼记》亦云：“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可见，爱与恨是相伴而生的。因为爱国太切，所以才对败国者卖国者恨之深呀！没有大爱，焉来大恨？倘若有人曰：“中国灭亡了，与我有什么关系？”此人的不正常，未必是生理上的，绝对是心理上情感上出了问题。人不可以缺乏情感。当然，有人只爱自己，漠视其它，此乃“小爱”也。有人爱自己，也爱他人、爱故乡、爱职业，可否称之为“中爱”？而有人把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置于爱我之上，爱我之先，那就是“大爱”了。看来，爱与恨，应该有对与错、大与小、高与低的层次之分、境界之别。生活的历史揭示一条规律：惟大爱大恨之人，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先于一切，才能造就时代的英雄。方志敏就是一位具有大爱大恨品质的民族英雄。

同时，需要行动，需要投入。“唤起民众”，“手执武器”，坚决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坚决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推翻来，这是一场流血的斗争、生死的搏杀。其实，抗日也好，反蒋也好，这都是出于一种无奈。这确实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铁蹄踏破了中国，谁也不甘心做亡国奴；因为蒋介石反动派肆意屠杀革命和群众，谁也不情愿做刀下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

声”，起来，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方志敏的一生，想着爱国救国，说着爱国救国，干着爱国救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他用自己的全部行动、全部投入，践行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是言行一致者。

第三，需要新潮，需要新路。爱护中国，拯救中国，光依靠热情、依靠行动还是不够的。君不见，众多爱国志士的一次次救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革命需要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样板，需要把时代最先进的理论、最成功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实践相结合。方志敏与早期共产党人毛泽东、彭湃等同志一道，以开放的视野、开放的心态，接受了马列主义。用方志敏的话说，“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方志敏的笃诚，还在于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理论，已经在苏联付诸实施并取得了伟大胜利。所以，“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共产党，但共产党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当自己正式加入共产党时，他感到自豪：“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在爱国救国的过程中，方志敏也曾经“国共合作”了，但一次次残酷的事实，让他最终认识到：“中国国民党，已成为中国一切灾祸之根源！”“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民族的唯一武装。”这是事实，这是真理。“黑暗的”中国，只有依靠新的理论、团结新的力量、谋求新的道路，才能“跳入”“光明的”中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解码方志敏，不难发现，他一生最深挚的情感，全部奉献给了“国家”；在爱国救国的过程中成就了他的辉煌事业。

（三）方志敏扎根于爱国救国实践的源头提升人性品质

方志敏的人生是短暂的，殉难时仅 36 岁。从南伟烈“退学”、漂泊上海、寻找革命开始，真正投入救国实践的时间，也只有十几年。自 1925 年起，他一直以故乡弋阳、赣东北为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发动民众，组建红军，成立政权，发展经济，高举红色的苏维埃旗帜，实现他的爱国救国梦。在这十几年的救国实践中，方志敏始终扎根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受到他的影响，“爱国救国”进入了这块土地的日常生活的，“爱国救国”成为广大民众的日常语言。应该说，这是方志敏爱国救国事业成功的标志。源于这种长期的爱国救国的社会实践，源于这个认识中国最坚实的逻辑起点，方志敏获得了最有价值的发现，那就是：“可爱的中国”。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

咳！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装饰起来；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啊！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

堂堂的中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且不说有众多外国欺侮，否则，怎么会出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竟连许多中国人